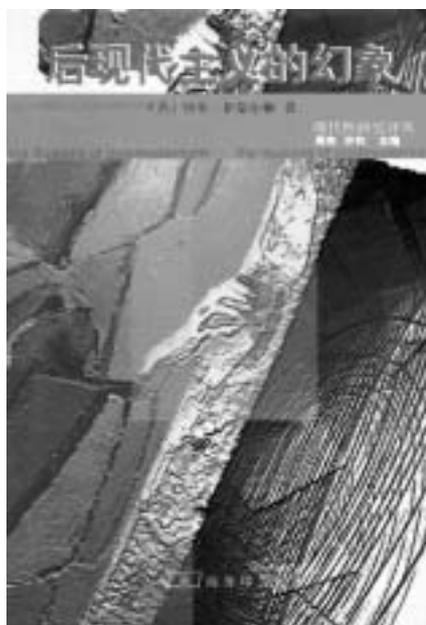


## 激進還是犬儒？

● 劉 擎



商務印書館去年翻譯出版了伊格爾頓的《後現代主義的幻象》，中譯本配有完整的索引、註釋和原著頁碼，還特別邀請作者撰寫了「致中國讀者」的序文，頗有老字號出版社的傳統規範。但譯文水準卻讓人難以恭維。

伊格爾頓著，華明譯：《後現代主義的幻象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0）。

商務印書館去年翻譯出版了伊格爾頓 (Terry Eagleton) 的《後現代主義的幻象》(*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*)，中譯本配有完整的索引、註釋和原著頁碼，還特別邀請作者撰寫了「致中國讀者」的序文，頗有老字號出版社的傳統規範。但譯文水準卻讓人難以恭維。華明似乎是一位小心謹慎的譯者，

將一部流暢揮灑的著作譯得刻板而不無晦澀，或許是對論題領域的生疏而不敢妄自變通，於是採取亦步亦趨的「忠實」手法，以求「保真」而不惜「失神」。但如此「委屈求真」仍不免閃失，僅舉如下兩處「硬傷」。

“Communitarian”是原著中出現了幾十次的重要概念，竟然一概被譯作「共產主義論者」，讓人跌破眼鏡，譯者似乎對政治理論界熟知的「社群論」或「社群主義」一派聞所未聞。全書結尾倒數第二句的譯文令人費解：「它（指後現代主義）在對抗它的政治對手左派——左派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是它的對手——的時候，它需要強有力的倫理學甚至人類學的基礎」（中譯本，頁152）。對西方知識界略有知曉的讀者一定會心生疑惑：左派怎麼會成為後現代主義的「政治對手」？核對原文才發現，譯者完全搞錯了原文的主語。原作者明明白白寫的是「左派在與它的政治對手抗爭之中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堅實的倫理學乃至人類學的基礎」（In confronting its political antagonists, the left, now more than ever, has need of strong ethical and even anthropological foundations; 英文版，頁124）。

翻譯工作很難徹底排除疏忽所造成的誤譯，但譯者如果對西方學術圖景具有基本的了解，就完全可以憑藉「理論常識的敏感」來避免這類高中生都能發覺的「硬傷」。否則，即便是「識單詞通文法」也很難勝任這樣的理論譯著。近來譯作泛濫，質量問題屢遭苛評，老字號的商務當引以為戒（由於譯本的質量可疑，以下筆者所用引文都出自英文原版，特此說明）。

西方後現代主義的旗幟下集結了相當一批左翼學者，其重要的「根據地」在文學理論界。而牛津大學教授伊格爾頓正是聲名赫赫的左翼文學理論家，他親自出征挑戰後現代主義，很像是在大本營附近的一次暴亂，即刻引起關注。由於警覺到右翼份子可能因此而幸災樂禍，伊格爾頓在前言中特別做出「劃清界限」的聲明：儘管保守主義者可能會出於某種「最不名譽的原因」而支援他的某些觀點，他仍然不願迴避對後現代主義的批判。因為他相信，「左翼聯盟的政治基礎應當是真理而不是機會主義」（頁x）。在這部一百多頁的著作中，伊格爾頓對後現代的「政治盟友」毫不姑息，以近乎刻薄的犀利言辭揭露後現代主義的種種幻象。

首先，伊格爾頓對後現代主義的盛行做出了獨特的政治心理診斷，認為這是左翼運動失敗的文化徵兆，雖然戴着反抗與批判的激進面具，實際上是一種犬儒主義的政治退卻。近二十年以來西方左翼政治遭受巨大挫折，就是在這樣一種深重的失敗感中，後現代理論在公眾文化中日趨流行，以把玩「我們如

何可能理解世界」代替「對世界的行動」；以否定主體、歷史規律、總體性和普適性來面對似乎無可戰勝的資本主義體制。因為如果根本不存在一個有待於改造的總體制度，也沒有充分一致的主體能夠承擔改造的行動，而任何反對的立場已經被權力的詭計所制約（頁28），那麼，知識份子就有了體面的托辭，可以心安理得地放棄革命性變遷的訴求，而將批判的焦點從體制的基本問題（如生產方式、社會形態等）轉向「裂縫與邊緣」——「文本、語言、欲望、身體、和無意識」（頁16），並在「混亂的、曖昧不清的、不確定」的理論中製造某種批判話語的繁榮。

對於一個正在經受失戀痛苦的人，很容易被諸如「世界上根本沒有愛情」之類的說辭所誘惑，不止可以借此解脫，甚至可能從中產生興奮與喜悅。在伊格爾頓看來，後現代主義的盛行是一種政治失敗的病灶，是知識份子在「歷史終結」陰影之下的退卻和逃避，是為掩飾創痛而自我安慰的一場假面舞會，並自欺欺人地將它扮演成一場解構的革命狂歡，而實際上這種犬儒策略正在成為維繫現存體制的政治合謀。

在學術言路上，伊格爾頓採用了一種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」的批判方法。後現代主義的出發點是破解啟蒙話語中人的主體性、「大寫的歷史」和理性等等觀念的內在矛盾。而伊格爾頓卻以類似的「解構方式」，揭示後現代的「無主體」、反歷史，以及文化相對主義的差異觀念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幻象。在這個意

西方後現代主義的旗幟下集結了相當一批左翼學者，其重要的「根據地」在文學理論界。伊格爾頓是聲名赫赫的左翼文學理論家，他親自出征挑戰後現代主義，很像是在大本營附近的一次暴亂，即刻引起關注。他相信，「左翼聯盟的政治基礎應當是真理而不是機會主義」。

後現代主義否認總體、本質和目的，同時將所有的差異特殊化，成為無可估價的「他者」，這實際上引入了某種新的普遍主義——文化相對主義。更嚴重的是，將所有差異和價值平等看待會使價值這一概念變得空洞，從而喪失了政治行動的目的，後現代主義也就因此失去了其批判性，而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精神形成共謀。

義上，這是對後現代主義的一次「後現代式的批評」。

在人的主體性問題上，後現代主義開啟的一個觀念轉變是「從作為主體的身體轉向作為客體的身體」。「自我」完全被各種外在的力量所「建構」，只是「凝視、銘記和規化」發生的場所，完全沒有所謂本質和自主性可言。伊格爾頓認為，後現代的這種極端「去中心化的自我」(decentered self)，與它所批判的那種「原子化的、非關係性的、無歷史的、基於形而上學的主體性觀念」是同一種邏輯的兩個極端(頁90)，具有同樣的理論謬誤，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險的。如果不存在相對自主的、穩定的主體，那麼也就沒有甚麼「自我」有待於「解放」，作為政治反抗的解放觀念本身也將被徹底拋棄(頁42)。

伊格爾頓還指出，「文化主義」思潮對共同人性觀念的完全否定同樣具有內在的矛盾。後現代主義指控普遍人性的觀念具有「本質主義」的罪名，認為不存在任何實質的、普遍的人性，所謂人性是一種文化建構的觀念，不同的歷史和文化造就了不同的「人性」。而伊格爾頓認為，這種文化主義的立場往往導向極端的相對主義。雖然文化主義的發端或許是出於良好的意願——批判西方傳統對其他文化的排斥，但如果將反對西方文化的霸權建立在「不存在任何絕對價值和人性概念」的基礎之上，那麼這種批評策略將導致自我顛覆的命運。「如果所有文化都是內在地自認正當，那麼我們對任何其他文化予以判斷就會有帝國傲慢的嫌疑。但是，同樣的邏輯

也使得其他文化對我們的文化無從評判……，對所有來自所謂第三世界的反帝吶喊，我們都可以置若罔聞，因為他們對我們行為的闡釋依據與我們無關」(頁124)，「人們也就可以無批判地遵從『自由世界』的信條」(頁27)。因此，文化主義的人性觀反而保護了西方文化免於任何實質性的批判，從而有助於維持其支配地位。

在西方學術界，「本質主義」早已被釘上了理論的恥辱柱。伊格爾頓指出，這本身是缺乏反省的陳詞濫調。「對本質主義的信奉並不需要接受那種不可理喻的觀點，即事物的所有屬性都是本質性」(頁91)。某種形式的本質主義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須的，我們只有藉此才能界定人的哪些需要確實是本質性的。伊格爾頓認為，人類確實分享了一些共同的人性——「那些對我們的生存與福祉本質性的需求，如食物、保暖、同伴和一定程度上的身體完整」，而「任何否認這些需求的社會秩序都可以因其否定人性而被挑戰」(頁104)。他認為，後現代主義否認總體、本質和目的，同時將所有的差異特殊化，成為無可估價的「他者」，這實際上引入了某種新的普遍主義——文化相對主義，在邏輯上是不自治的。更嚴重的是，將所有差異和價值平等看待會使價值這一概念變得空洞，從而喪失了政治行動的目的，後現代主義也就因此失去了其批判性，而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精神形成共謀：一切價值都由供求所決定，人不過是生產與消費機制中的被動自我。

這部著作也有極少的篇幅對後

現代主義的某些積極因素和正面貢獻予以肯定：對特定語言與思想模式的反省，對那些以前被忽視的少數和弱勢的關注，對種族、性別的「他者」歧視予以揭露。但總的來說，伊格爾頓所描述的後現代主義充滿曖昧、謬誤和矛盾，是自我顛覆的理論，在政治上是無力而虛弱的反抗策略。「它的文化相對主義、道德約定主義、懷疑主義、實用主義和局部論，對團結和訓誡組織理念的摒棄，缺乏政治行動者的適當理論」，所有這一切不只是不可欲的，而且是完全不必要的(頁134)。

掩卷之後，我們也許可以追究一個問題。被歸入「後現代主義」家族的理論家具有如此複雜而迥異的面貌，伊格爾頓在整本書中沒有具體針對任何一個重要的後現代理論

家，沒有細緻分析任何一部後現代的代表性著作，而只在簡單歸納和籠統概述的基礎上展開犀利的抨擊，這種批判雖然令人讀來酣暢淋漓，但是否具有足夠的正當性？它本身是否製造了一個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誇張的、不真的幻象呢？也許，可以為之辯護的是這樣一個事實：後現代論述作為「主義」，已經不再是純粹的學術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脫離了象牙塔中個別學者的具體工作，而作為一種流行話語進入到公眾的政治與文化生活。對於這種流行的後現代主義現象，伊格爾頓的批判具有足夠的有效性。而對於具體的後現代「學說」，或許需要另一種不同的研究與批判，也將會遭遇另一種複雜與困難。

伊格爾頓在整本書中沒有具體針對任何一個重要的後現代理論家，沒有細緻分析任何一部後現代的代表性著作，而只在簡單歸納和籠統概述的基礎上展開犀利的抨擊，這種批判雖然令人讀來酣暢淋漓，但是否具有足夠的正當性？它本身是否製造了一個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誇張的、不真的幻象呢？

## 圖片來源

封面、封二 王苗作品；文字：金觀濤。

頁14 張倫提供。

頁26 Sam Szafran, *Escaliers* (1992-1995).

頁42、43 劉小軍作品。

頁58、78 資料室圖片。

頁81 焦小健：《背影》(1998)。

頁82上左 焦小健：《老樹》(局部，2000)。

頁82上右 焦小健：《反射》(局部，1998)。

頁82下左 焦小健：《假以天年——再現時光III》(局部，2000)。

頁82下右 焦小健：《盆花》(1998)。

頁83上左 焦小健：《假以天年——再現時光V》(局部，2000)。

頁83上右 焦小健：《網絡》(1997)。

頁83下左 焦小健：《網絡》之一(局部，1997)。

頁83下右 焦小健：《凝視》(局部，1997)。

頁84 趙軍：《青灰·小街》(局部)。

頁93 *Science* 292, 2227 (22 June 2001).

頁94 方唐：《敵情》。

頁135 渠敬東：《缺席與斷裂：有關失範的社會學研究》(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9)，封面。

頁143 理察·波斯納著，高忠義譯：《老年、社會、法律經濟學》(台北：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1)，封面。

頁146 Jean C. Oi, *Rural China Takes Off: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99), cover.

頁149 金光耀：《顧維鈞傳》(石家莊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9)，封面。

頁152 劉千美：《差異與實踐——當代藝術哲學研究》(台北：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1)，封面。

頁156 伊格爾頓著，華明譯：《後現代主義的幻象》(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0)，封面。

封三上左 趙軍：《炭黑·歸人》(局部)。

封三上右 黃慶：《雙肖像》(局部)。

封三下左 焦小健：《假以天年——玉蘭開花II》(局部，2000)。

封三下右 焦小健：《假以時日——石榴結果》(2000)。

封底 焦小健：《雁蕩山之松》(1997)。